

香港傳真

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08-82

2008年11月20日

智慧老人杜潤生引領民主二三事

中國稅務雜誌社 張木生

時間如白駒過隙，2008年7月18日，杜老95歲華誕。驚回首，相知、相識、相隨杜老28年過去，如穿越了時空隧道，彈指一揮間。杜老仍思維敏捷，但已行動遲緩，口齒吐字不甚清楚。馬阿姨已不認人，只認杜老，這相濡以沫的老伴。一絲惆悵，才下眉頭又上心頭……

我第一次與杜老有直接交流是1980年夏天，我和王小強參加杜老在萬壽路賓館主持的一個座談會，在座的多是各省農口的領導，主題是基層幹部問題。當時包產到戶初露端倪，乍暖還寒。基層幹群矛盾突出，發言者對基層幹部頗多微詞。杜老突然點將，“讓在農村插過隊的年青人說說。”小強和我只表述了一個觀點：基層幹部，是我們黨在農村的惟一組織資源，體制正確時，

幹好事的是他們，體制錯誤時，幹壞事的也可能是他們。除了他們，我們在農村不可能找到另外的替代力量。杜老投來讚許的眼光，鼓勵我們繼續講。我補充：“就像大鬧天宮和西天取經是同一個孫悟空一樣。”杜老嘿嘿地笑起來：“噢？你們年青人也這樣認識？”顯然是表彰，杜老拉著我們倆年青人與他同桌進餐。霍泛伯伯邊吃邊敲邊鼓：“老杜啊，你不總想找一些有理論有實踐的年青人共同搞調研嗎？”杜老笑而不答，他要觀察我們，考量我們。那是我第一次近距離觀察這位智慧老人，也是我第一次聽到他說：“農民窮，中國窮，農民古代化，中國不可能現代化，誰要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忘記農民，誰就是數典忘祖！”一塊鉅大的磁石，只一次就吸引了我。

隨著我們這群年青人下鄉調查的次數日多，與這位智慧老人的交往日增。當時包產到戶方興未艾，支持者與反對者的爭論也白熱化，兩軍對壘，非此即彼，黑白分明。文革雖已結束多年，但多數人仍是作慣性思維，路線鬥爭，不是東風壓倒西風，就是西風壓倒東風，沒有調和的餘地。

八億人，不鬥行嗎！杜老反之，十億人，不鬥就行。

杜老主張“道並行而不悖”，見仁見智，互擅勝籌，匯合各方主張，相互容納，各家見解雖有不同，但經過論辯，即為集思廣益，必能激蕩出完美的政策方向。可謂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”（《禮記·中庸》）。對集體經營、包產到組、包乾到戶，杜老提出了著名的“可以……可以……也可以”的公式。爭論的雙方也就此盡釋前嫌，“相逢一笑泯恩仇”。從此包產到戶一發不可收，如燎原之勢，而觀點不同的人們，恐怕是第一次道不同可同謀，沒有上綱上線，不受路線鬥爭之困。我親耳聽萬里同志說過，為什麼同樣的道理，從我們口裡說出，和從杜潤生同志嘴裡說出就不一樣，話讓他一講，不同意見的雙方都能接受。這之後，實

踐中，產量說服了方向。

杜老善用辯證法，而且如臂使指，將複雜的事物抽絲剝繭，提煉為哲人的理性。我隨杜老到西安研究包產到戶後，個體工商戶如影隨形成長起來，出現私營企業僱工經營。姓社姓資的爭論立刻出現。杜老不溫不火，他提出改革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，要多用歸納法，少用演繹法，到實踐中去找答案，標準是被僱的農工滿意不滿意，答應不答應。結果是短短幾年，鄉鎮企業異軍突起，多種經營遍地開花，農業生產力高歌猛進。1980年~1986年，那是農村變革的黃金時代！

杜老就是這樣，在波瀾不驚，有條不紊之中，推進歷史的鉅輪發生了石破天驚的變化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靜悄悄地走下神壇，卻未發生任何震動，這是何等的大手筆！

有一次，隨杜老到中南海彙報糧食問題。記得高小蒙還拿出數字模型證明，中央手中只要保持1280億斤糧食，用保護價收購，剩下的所有糧食可完全放開，取消糧票，市場化經營。這就是“穩一塊，活一塊”的漸進改革模式。這時，一位中央領導說，你們年青人還這樣保守，中央留一千億斤足夠了，剩下的全放開。話音剛落，一位青年人很衝動：“你們中央想什麼呢？我們提的數據是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與反復測算出來的，不是拍腦袋！”這位中央領導馬上向衝動的年青人走過來，拍著他的肩膀，和顏悅色地說：“你們慢慢說，我仔仔細細聽，好吧。”

走出中南海，我以為杜老會批評我們張狂。沒想到，他老人家嘿嘿嘿的樂，並說：“我就是要讓你們這些小傢伙為我們這些老傢伙投石問路。”

進入2007年，杜老還是那麼睿智。他在《炎黃春秋》上發表了兩篇文章，一篇是針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爭論，一篇是由姚監復代筆，他老人家口述有關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歷史還原。看了這兩

篇文章，我忍俊不禁，可謂人老成精，薑還是老的辣。有人說杜支持謝韜的觀點，我看未必。引原文：題目是〈理論思維活躍是民族振興的喜慶氣象〉，好聽又中肯。“一個黨，一個民族，如果沒有自己的理論思維，一定會衰敗下去。”切中時弊。中國什麼樣的產能都過剩，最大的危機，最稀缺的是信仰危機和理論再造。“有爭論是好事，不同的觀點，就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。即使錯了也不要緊，思想上的試錯，可以代替行動上的試錯。”大智慧而不失分寸。文路一轉：“謝韜文中有一個地方說‘只有民主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。’這個提法，口氣硬了，不一定妥當。現在中國並沒有出現民族危機。”看似輕輕提起，卻一語中的。“什麼是中國特色？首先是不要蘇聯特色，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。這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的。那麼，要不要瑞典特色？瑞典是八百多萬人口的小國，我們是13億人口的大國，大國怎麼搞？恐怕也不可能全盤接受瑞典模式。”結論已不言自明，杜老的大智慧，逢右必左，逢左必右，左派右派見杜老都皆大歡喜，但他又從不失原則，極高明而道中庸。¹

杜老另一篇耄耋之作，我手頭的《炎黃春秋》未找到該期，但記憶深刻。杜老還原了新民主主義理論歷史的本來面貌，指出，無論是理論的徹底性，還是實踐的完整性，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望其項背，無出其右者。今天仍是我們無法超越的指導思想和政治、經濟、社會改革的初始點。事後在網上看到此文，將小標題摘抄如下：一、新民主主義革命為實現社會和諧提供了根本前提；二、建國以來失誤的根源是脫離了中國國情，錯誤地拋棄了新民主主義論，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；三、解放思想，永不僵化，不被過去的錯誤的烏托邦式的聲明所約束，堅定地走新

¹ 杜潤生：〈理論思維活躍是民族振興的喜慶氣象〉，《炎黃春秋》2007年第6期。

民主主義道路。

如今，尼泊爾共產黨（毛主義）取得政權，其領袖普拉昌達總理宣佈，要在尼泊爾全面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，由共產黨領導在尼泊爾發展資本主義作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措施。這不能不說是對這一理論的發明者的反諷。

兩篇短文，舉重若輕，精心構築，恢宏佈局，深謀遠慮，必勝戰略，百折不撓，念念不忘，雖垂垂老矣，耳聾眼花，其人格魅力就在如何把中國的事辦好。

這十年，我和愛人王祺元經濟條件好轉，我們倆有更多的能力呵護兩位最敬重的師長，一位是王耕今，去年96歲駕鶴西去；一位就是杜老，在他遠離權力中心之後，我們與他和馬阿姨越走越近。但無論你與他走多近，你永遠無法改變他看問題的原則和角度，即使衆口一詞，杜老總有杜老自己的說法，他一貫保持的是自由之精神，獨立之思想。我特想影響杜老的思路，但從沒成功過。而對人，他總是海納百川，有容乃大，包括整過他的人。有時，我對杜老講某人的問題，只要口出惡評，答案總是這人有長處若干，那人肩膀很硬。杜老批評人，你若沒點悟性，還以為是表揚你呢。

“中國仍要過好兩關，市場關與民主關”。

杜老老而彌堅而矢志不渝，殫思極慮而知白守黑，撥雲見天而明察秋毫之末：“用市場機制激勵人，用民主政治團結人”。兩者缺一，改革便是焚琴煮鶴。現在的改革開放就是跛足的改革開放。

最後，講一件小事。十幾年前，我隨杜老到大連，調研之後，當地政府安排杜老參觀一座新開張的購物中心。陪同人員向杜老推薦了許多高檔商品，杜老一一婉拒，最後只給孫女選了一件小毛衣和一隻鉛筆盒。當我去結賬時，磨破嘴皮人家就是不收錢。

杜老看在眼裡，當時沒給任何人難堪。那時杜老的鼻炎很重，不斷地需要紙巾，鼻子都擦紅了，我將賓館的濕方巾用塑料口袋準備了一堆，隨時提供給杜老使用。回到賓館陪同人員漸次散去，杜老將我留下：“兩件事你辦得不夠好，購物款馬上送去，毛巾是賓館的，公產帶離賓館就不妥。”儒雅清瘦，仙風似閑雲野鶴，渾身上下沒有一點煙火氣味，說話綿軟，未語先笑的杜老還會批評人？他把我批樂了。

如小強所說，一眨眼過去30年，張木生退休（今年四月就該退，命令遲遲未下）！“白丁”變蒼頭，轉眼來到他們對我們充滿期待的年紀。杜老諄諄教導我們，每年要為人民做一二件能上賬的事，檢討自己，我很愧疚。

洞微燭隱，雖馬齒漸老，仍直言無忌。現在的什錦八寶粥之類的時賢，“因為是達官貴人，權豪勢要，士流耆宿，富商名家，同樣為觀瞻所繫，需要裝點些勤政愛民，為富近仁，學高德厚，儒雅風流，所以在公眾場合常常也要說些事先設計好的話，做些事先安排好的事，舉手投足有如做戲。這種事古已有之，所以戲臺對聯有‘大千世界無非傀儡之場；第一功名亦等俳優之戲’，點明了戲場小天地，天地大戲場這番道理。”²

難怪，毛澤東要“糞土當年萬戶侯”。

杜老總說他自己只是一個“符號”，我常想這個“符號”是什麼？參來悟去，乃真共產黨之謂也，真假不可不察之謂也。

² 陳四益：〈作秀的難處〉，《讀書》2008年第9期。